

# 顧頡剛自傳 (三)

(本文插圖刊第47頁)

● 顧頡剛遺著 (顧潮·顧浚恭校)

## 為搞出版進入商界

我的性格和才力，學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況持籌握算，孳孳為利的商界，臭味當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願去？這事說來，也有個久長的歷史。

## 集資經營書舖心得

一九二二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須辦理喪葬等事，我一時不能回北大服務，就請校中留職停薪，住在家裏。那時新學制頒布，商務印書館急須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招我到館任國文歷史兩種工作。蘇、滬路近，容易顧家，我就到了上海。這是商務的全盛時代，編輯部三百多人，全館職工三千多人，使我看到了現代化的出版企業。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錫琛都是同事，天天見面。有一回，振鐸激昂的說：「商務是靠教科書賺錢的，我們替資本家編教科書，拿的薪水只有一百元左右，而為他們發的財至少有一二百萬，我們太吃虧了！我們應當自己經營一個書店，到力量充足的時候也來出版教科書，豈不是我們一切的經濟問題都解決了！」大家聽了，個個贊成，過幾天就結合了一個團體，由于同起名，那時他醉心清代的樸學，定為「樸社」；推我為總幹事；每一社員按月繳付十元，作為公積。第二年教科書編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當，我就回了北大。

一九二四年秋天，江浙有齊、盧之戰，上海緊張，他們為有避難的迫切要求，把兩年來存儲的款子收回去了。我聽得這消息，大為不滿，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組織起來，其時參加的有范文瀾、馮友蘭、郭紹虞、吳維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蔣仲川等，編印書籍多種；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對門租賃房屋，開一書店，命名景山書社，作為門市部。我編的《古史辨》就是在這裏出版的；真想不到，這樣專門的東西竟銷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十版，因此這個舖子就站住了。但因我們都在大學裏教書，不能有一個專人集中精神來管理，而且商人刁滑，發出了書常常收不到錢，我們對付不來，至於銷路不暢的書，又徒然壓了書架，所以《古史辨》賣得雖好而這舖子還是不能獲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

出下去，不支版稅，門面賴以維持，居然延到了抗戰。抗戰之後，併入開明書店；開明原是樸社的上海同人開的，可說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因為有了一回開書舖的經驗，我總想和很能經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個模範，就是商務的張元濟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廠及商店。張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變時，西太后嫌他是新黨，給以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他不能在政治上發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學任教，後來和夏氏聯合而把商務擴大起來。

當時社會開始蛻變，大家知道四書五經已不適於作教科書之用，但想不出一種新式的教科書來。杭州人葉瀚摹做了千字文的形式編出了《天文歌訣》和《地球韻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學知識作成了四個字一句的東西，雖說是「舊瓶裝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讀了不能懂；而且沒有插圖，就是老師也何嘗懂得。南洋公學編了一種《蒙學課本》，開頭是單字，繼以兩字以上的名詞，又繼以句子，又繼以短篇文章，又繼以長篇文章，深得循序漸進之意。但這課本只有一冊，從單字到長篇文章在一冊內讀完，不知道他

(三)傳自顧頡

們要把這一冊書佔據一個孩子的多少時間？如說一年，孩子知識的進步那能這等快？如說五年，那麼一課書是不是讀半個月？所以這還是不適宜的。

大約張先生也感到這個困難，所以他進了商務之後就集合許多人編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其循序漸進的方式和《蒙學課本》一樣，但是它分為十冊，每課都有插圖，每冊都有彩色圖兩幅，圖文對照，更沒有看不懂的；選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兒童高興去接近。

這部書一出來，大家覺得耳目一新，競買給子弟讀，雖是私塾先生教慣四書五經的也教學生換讀這書，中國的新式教育在這書上奠定了基礎，商務的商業資本也在這書上大量的擴展，於是商務執了文化界的牛耳。張先生在這個時候要幹他的本行了，就編《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許多好版本介紹給讀者。這又是一個大貢獻。我深信以我的興趣和才力來步武張先生的後塵，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那裏去找？

### 書局企業新式生產

我常夢想着我如能把握一個力量充足的書肆，我當作兩條路的開展，一條路是新的，一條路是舊的。所謂新路，就是民衆讀物。我們以前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出了六百種小冊子，銷了五十萬本，可見民衆是怎樣需要新的讀物。近數十年來，教育漸漸普及，民衆識字的日多，但他們識了字之後就苦於無書可讀，只能看幾本舊唱本，舊戲劇，舊小說。這都是幾百年或幾十年前所作

，思想非常陳腐，毒素太多，他們受了新式的識字教育之後，如想再進一步，便非接受這種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豈不可駭可痛！豈不是識了字反而害了他們！我們以前編輯民衆讀物，主要目的在激勵他們的民族思想和對於日本軍閥的仇恨，太過單調，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沒有新式的民衆文學家，要寫別的東西不容易寫，只有這一套可以提起筆來就是。這在正常的狀態下是不合適的。我們要做好這個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規模的徵文，無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筆斐然，思慮靈活的給與進修的機會，而在進修期內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繳到幾次成績，這樣就可使他學識與技術同時並進，學識愈高，通俗化的技術也愈高，如此，民衆的知識也就跟着他提高了。

這當然要花一筆大錢，可是這筆錢花出之後是有報償的，是有優厚的利息的。國家爲了教育民衆固然應當做，就是持籌握算的商人只要他們眼光放得遠一點也該做。教科書只有在校的學生讀着而已，而已使商務在過去四十多年中成了書業的領導者。何況這民衆讀物是普遍到各階層的，工、農、商、兵無不可看，教師、學生無不可看，家庭婦女無不可看，只要會做，將來擴大爲幾個以至幾十個商務印書館也不難咧！這是新的一條路，正銜接着商務的教科書而前進的。

至於舊的，就是整理古書，使得凡是讀中國古書的人必須看我們這一部，使得這一部成爲長時期的標準本。張先生的《四部叢刊》固然有價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樣介紹出來而已，至多

只有把一兩種古本對勘，附一校勘記而已，根本他沒有整理，後學者是不容易看的。何況古本並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學者的校刻本，他們已經把許多古本集合校勘，並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學和經學根柢之好，讀書之淵博，當然這些本子的價值遠在宋、元刻本之上。張先生專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責備賢者的眼光看來，未免古董意味太重。

至於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和《叢書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紹舊籍；他把古書印成小冊子，易帶易藏，這設計也不錯；他把古書斷句，便於尋省，更適合於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斷句的錯誤和校勘的粗疏，數也數不清，如果給我時間替他做一個勘誤表，篇幅該和《牛津大字典》一樣多。我每每看他的書，總要蹙額疾首，說：「古書碰了王雲五，真走上厄運了！」他爲什麼這樣？因爲他要出得快，把古書發出去請入點，一頁兩毛錢，人家貪圖錢多，儘快的點，點畢交他，他又不請人覆看，馬上發印，以致不但有錯字錯點而且錯頁的。線裝書每頁有錯頁，第一頁接着第三頁，再接着第二頁、第四頁的；到王雲五印書的時候，點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馬虎，就隨順了這個錯誤。當這錯頁在線裝書裏，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頁數自然明白；現在既已重排，原來頁數已不存在，當讀不下的時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對否則再也讀不下了。所以王雲五真是舊書的蠹賊，固不待金元券的發行而即知其大膽妄爲，害國病民了。

又中華書局摹倣商務，出了一部《四部備要

▽，既為介紹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測起來，他們發刊此書的目的恐怕只為替仿宋字作宣傳的。我們如做此事，應在大學文史兩系的學生中選取學問有相當根基而心又仔細的，加以幾年的訓練，然後令他們到各圖書館、各藏書家搜集古本和善本，作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家家的注彙合起來，汰劣存優，作一個「集注」，然後加以標點、分段，作校勘記和索引，使得讀者得了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騖。這才是真正的整理，必有了這個整理而後古書可讀，古人遺產的真面目可為極遠的後人所認識。印行古書固在現在時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則今日必做，因為能讀古書的人越來越少，在二三十年內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請他們擔任整理的工作，到時局安定，大家想讀古書的時候，這已是不可挽回的損失了。

而且現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國，通漢文，讀中國古書的日多，只要看兩部《皇清經解》在市面上絕了跡，就可知外國人搜購我國線裝書數量之多到了什麼地步。我們印出這種標準本來，不但全中國的圖書館和大學都要置備，即全世界的圖書館和大學也無不要置備，而且有永久的銷路，我們為什麼不做。這是舊的一條路，也是銜接着商務的《四部叢刊》而前進的。

我懷抱了這樣一個大計畫，可惜找不到大資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見商務的總編輯張天澤，他為和總經理王雲五搞得不好，正謀改業，他有志自辦一個出版機構。我想，他是廈門人，廈門是商業中心，他從小耳濡目染，想來他懂得

經商，他是學經濟學的，在商務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術和金錢的運用，更具備了適宜的條件，因此慫恿他幹。經過許多朋友的幫助集股，到一九四四年集到了一千萬元，當時可換得黃金廿條，雖不算多，比了我們的樸社究竟寬裕了。機構成立，定名中國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慣了王雲五的幹部，沒有獨擋一面的勇氣，進一步退兩步，遷延復遷延，存在銀行的錢愈來愈貶落，我的極熱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這時，我到北碚遊覽，認識了亞光與地學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緯宇等在抗戰揭幕後創辦亞光，製印地圖。為了那時逃難的民衆和開拔的軍隊都需要地圖做旅行中的參考，有一種袖珍的《中國分省圖》竟於數年內銷了三十五版，每版一萬冊，奠定了他們的經濟基礎。這時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廣西一帶推銷，他則為了邀請製圖人員到重慶。到了之後，知道科學工作人員集中在北碚，製圖以北碚為最宜，所以他在那邊蓋了幾間屋，設立中國製圖社。既和我遇見，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發展，就請我加入，成立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推我為社長。

我家居柏溪，離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無法延醫購藥，死了連棺材都買不到，託人從磁器口買了來才得成殮，因此我痛恨這窮鄉僻壤，要遷家到有醫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這條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長。過不多時，金氏昆仲來碚，協議擴大組織，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國圖書局。我當時在喪妻之際，不但積蓄都光，而且負債累累，那能加

入股子。承他們的好意，替我加入廿萬元，於是我也成了書局的股東。抗戰勝利，書局遷到上海，再謀擴充資本，定股份總額為二億元。那時幣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較多，陸續付款，到招股截止時湊足了兩百萬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

一九四六年七月，開股東大會，萬想不到，被推為總經理兼編輯部主任。副總經理陳宣人，前在商務擔任事務多年，抗戰期間在重慶辦大信文具公司。經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亞光總經理；一丁君甸，前生活書店及大公報館的函購部主任。協理一人，金緯宇，即亞光的副經理。他們為什麼選我呢？一因我年齡最長，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遊衆多，做書店生意不能無教育界的聯絡。我堅決的辭謝，因為我實在不會做經理部工作。但他們說：「不妨，經理部的工作自有我們作，不來煩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聯絡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雖負了總經理的名義而仍住在蘇州。公司有事，打一電話來，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蘇州住了兩年，擔任社教學院的教授。

### 戰後家產全都完了

在這裏，我當說一說我的家庭狀況。我們顧家大都住在滬寧路沿線，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時是唯亭鄉的一個富農，每逢災荒即捐出大量的穀子。到萬曆間遷到蘇州城裏，從此專事讀書，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書或游幕。太平天國時代，蘇州城裏受了嚴重的兵禍，祖先產

業蕩然。我祖我父兩代辛勤，又掙起一份家產。到我父老年，有田四百畝，屋五十間，現款四萬元。

這份產業也不算小，但與我無干。因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撫養成成人，我自小和繼母齟齬，而我的堂叔又覬覦我們的產業，看我父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趕掉，我家的產業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繼母常在我父親面前交互說我壞話，挑撥我們父子間的感情，所以我決心遠離家庭，自祖母死後撤座，就把妻女們接到北京，說：「從此這個家不是我的家了！」當北京政府欠了一兩年的教育費時，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親看見報載情狀，寫信給我，說：「要不要我接濟！」我咬緊牙關，說：「男在此自有辦法可想，請大人寬懷！」實在，當這教育界普遍的貧困時，想辦法是何等不易；我只怕父親寄了錢來，繼母和叔父更進讒言，寧可拒絕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

我父收入多而開銷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這點積蓄。繼母和叔父都亡故了。抗戰之際，我父病逝，我不得歸家治喪。田地託給姻戚管，他爲了抽大烟，賣去了兩百畝。抗戰結束，我回到家裏，存在銀行的現款又成了廢紙。爲辦婚喪，又賣去了百餘畝田。到這時，我父遺下的產業只有房屋可以收到一點租金，其餘全完了。爲什麼說全完了？因爲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提到這件事，我要爲蘇州的地主說幾句公道話。別地方，田主自己管着田，農民直接受田主的剝削，而蘇州則不然。我們的地主是和佃戶不見

面的。所以這樣的原因，就爲蘇州人太喜歡享受，無論有錢沒錢，衣食總求美好，每一個男子總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來度他的日常生活；因爲這種生活太有規律了，自早起到夜寢都有適當的支配，弄得不但遠地方不能去，即離城不遠的鄉間也憚於涉足，所以城裏的地主簡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麼地方。這種「大少爺」的派頭是明、清全盛之世養成成功的，爲了這樣，所以無錫、南通成了工業區，上海成了工商業區，而蘇州的地主只能在糊塗的生活裏度過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漸漸地沒落下去，而不會學了人家改變生產的方式。在前清時，農人抗不繳租，還可請求官廳替他追繳，用打屁股來威嚇他們。但民國成立，官廳早已不管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鄉，所以佃農不繳也只得任他。在抗戰前，繳納的已經不多，靠田租過日子的顯出奄奄待盡的樣子。抗戰後一切失了常態，繳納的竟成爲例外。我父親未死前曾對我說：「你做到五十五歲，就歸家來專心著作罷，我積下的產業是够你養老的。」但一九四六年，我自重慶歸來，百畝的田租僅僅收到法幣十萬元，不足半月的家用。我知道沒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書局的企業，走上了新式生產的道路，心想：吃飯問題總不太嚴重吧？

### 印就圖書作還魂紙

大中國圖書局開張在上海之後，營業極佳，因爲我們在重慶已繪了好些地圖，外蒙讓出去了，臺灣收回來了，東三省變爲東北九省了，這些變動上海書肆都尚未畫出而我們已都有了，在勝

利之後人心振奮的時候我們印一版就銷一版，甚或我們尚未再版而定貨的已來，大有供不應求之概。但國、共談判破裂，戰事一起，發行網就縮小了一半。以後解放區日廣，到上海國軍消滅之前，我們的發行網竟不出上海。而且爲了工商業的不景氣，購買力也萎縮非凡，就是上海一區也遠非昔比。到這時，我們的地圖是沒有銷路了，只靠了販賣鋼筆吃飯。我爲書局編的一套《中國歷史故事小叢書》一百數十種，出了十餘冊就出不了。特約呂叔達編的《中國通史演義》八十回，編輯部裏用了五六年的氣力繪出的二百萬分之一的《中國分縣地圖》，其細密爲歷來坊間所沒有的，都不能付印了。這多麼痛心！

我在蘇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够用，但蘇州這地方，游手好閑的太多了，借錢、求薦的麻煩不必說，就是不借錢、不求薦的人上門，他們沒有時間觀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沒有這閑暇去陪他們。然而多是本家、姻親和上輩的朋友，得罪不得；爲用出我的力量在正當工作上打算，我非遷出蘇州不可。所以辭掉社教學院的教職，於一九四八年遷到上海，專做書局的事。我在書局，雖不能任經理，但編輯是可做的，我當然可以一心一意編出幾部書來。只是時局動盪過甚，局中營業日落，我的薪水一減再減，打了一個對折，爲要維持家庭生活計，只得兼教書，所以我便於解放前就將維喬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誠明文學院的教授。

解放之後，發行網寬得多了，可是又有難問題來。地圖是表示政治區劃的，區劃改變地圖就

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貨，要造貨就須有生產資本，但我們的流動資本已乾涸了，造新貨談何容易。原印的圖，一切不合適，只有賣給紙廠造還魂紙。再則，新印的圖是否合適也是問題。例如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編了一冊《蘇聯新圖誌》交給我們印，我們覺得這些編者都是專家，料不會錯，就出版了。那知出版之後，得到出版總署胡署長的信，說：「其中有『帝俄東部發展圖』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我們把這個意思告給地理研究所，他們答道：「帝俄時代的事自有帝俄負責。而且帝俄不但受蘇聯的攻擊，也受我們的中蘇友好協會劉少奇主席的攻擊，為什麼不能把他們過去的事實揭發出來！」出版總署是國家機關，地理研究所也是國家機關（今已併入中國科學院內），爲了他們步伐的不一致，害我們鋪子賠了三千萬元，這種苦痛該向誰訴？本來我們已定出版民衆讀物，仍用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名義，在平津報紙登了徵文廣告之後也收得了些稿子，自從《蘇聯圖誌》生了問題，我們一再考慮，恐怕自己政治認識不夠，出了岔子，加以出版總署並不負責審查的責任，我們也沒法實正於政府，所以就改變方針，從學校的自然科學掛圖着手了。

### 躊躇再三退出商界

在這個大時代裏，我自問無應變之才，越來越覺得無能。一九四八年，金元券一日數落，局中同人無不賦窮，不絕的向經理部請求增薪。編輯部因爲由我主管，工作人員向我要求更切。我

因爲這是實在的情形，與經理部同人磋商增加津貼，然而那時正是營業極不振的時候，局方實不能加。我爭之再三，有一位經理就說：「顧先生，你究竟是什麼立場呢？你若是站在勞方，你的爭是對的，但你却是資方的總經理呀！」這句話駭得我啞口無言。

自從局中組織了工會，勞方與資方有共同組織的業務會議，以及福利、膳食、學習等等的委員會，關係愈來愈密切，鬥爭也愈來愈尖銳，我既負了總經理的名義，也不該不實際負總經理的責任，然而折衝樽俎非我所長，要我在勞資兩方

確定立場，尤非我所能，我真躊躇了，傍徨了！我還是退出了商界罷！下次開股東會議時，我決定辭職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五年歷史，我覺得商界確實好，他們固以營利爲目的，但這個目的是公開的，除了公開的競爭之外再沒有鉤心鬥角的破壞行爲。不像教育界人，口頭上清高萬分而實際上則較及銖銖，爲了一點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嫉忌，以致鼓動了別人來鬧風潮。可惜我進商界遲了，不然我必可踏着張元濟先生的足跡而前進。（全文完）

## 聖文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

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

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篇篇可讀。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